

※ 序跋選錄 ※

序卞東波編譯《中國古典文學與文本 的新闡釋——海外漢學論文新集》

孫康宜*

南京大學文學院卞東波教授是我所見過最好學的年輕學者之一。他對歐美漢學的熱情，及其對漢學研究的持續努力，令人感佩。兩年前他才出版了一部北美漢學譯文集，題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視鏡：晚近北美漢學論文選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現在他又完成了該書的續集：《中國古典文學與文本的新闡釋——海外漢學論文新集》。從這部「新集」的書名看來，「文本的新闡釋」乃是此書的重點。

其實「文本的新闡釋」也是目前歐美漢學的新趨向。一般說來，海外漢學家所處理的文本大多是學者們早已熟悉的材料，但如何能在細讀中發現新的涵義——就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說的，「在閱讀中，我們應當學會注意令人驚奇的東西」（見該書所譯宇文所安〈桃花源的長官〉一文）——那才是真正功力所在。

在此我應當說明一下，有關卞東波教授編輯兩本漢學論文集的緣起。當初他之所以開始努力研究北美漢學，而且從事這一方面的翻譯工作，乃是受了哈佛大學東亞系宇文所安教授的引導和啟發。最近，卞東波在一封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就很感慨地提起他當時「得益於宇文所安教授兩次邀請去哈佛訪問」的往事，以及他如何從宇文所安問學，並受他極大影響的學習過程。

宇文所安是我數十年來的老友，正巧他即將於今年退休，我剛寫完一首祝賀他榮休的七言詩，興奮之餘也就發給了卞東波，請他暫時保密（因為該詩要等到哈佛大學為宇文所安召開的退休會上才正式發表，希望給宇文先生一個驚喜）。詩云：

* 孫康宜，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講座教授。

祝賀宇文所安榮休

吐霧吞煙吟劍橋¹，唐音北美逞風騷。癢搔韓杜麻姑爪²，喜配鳳鸞弄玉簫。
舌燦李桃四十載，筆耕英漢萬千條。感君助我修詩史，恭賀榮休得嬉遨。³

可喜的是，此詩已由我的一位耶魯學生 Yvonne Ye 譯成英文：

Congratulating Stephen Owen on a Glorious Retirement

[He] exhales clouds, inhales smoke, chanting poetry in Cambridge

Tang tones [in] North America – literary excellence manifesting

Like Ma Gu soothing irritation, [he turns to] Du Fu and Han Yu

Like Nong Yu and Xiao, [he enjoys] the match of paired phoenixes

Forty years of eloquence scatters stud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 hundred thousand lines seeded by his pe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 thank him for collaborating with me 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a]

and congratulate him on a glorious retirement, to find joy in his roaming.

Translated by: Yvonne Ye



編按：孫康宜院士吟誦於「紀念宇文所安教授榮休國際座談會」（季進 攝）

¹ 宇文所安 1982 年從耶魯到哈佛執教至今。據說，宇文性嗜煙，校方特許他在辦公室抽煙，且特別在他的辦公室裏安裝一臺排風扇。

² 杜牧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見杜牧〈讀韓杜集〉）。宇文所安尤精於韓愈和杜甫的作品。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韓愈與孟郊的詩》，晚年翻譯杜甫詩全集，認為「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

³ 我要特別感謝耶魯同事康正果，在我構思及起草此詩的過程中，他給了我莫大的幫助。

我以為拙詩的末尾「得嬉遨」(to find joy in his roaming)的概念，似乎與卞東波編纂他這部《海外漢學論文新集》的本意不謀而合。我猜想卞東波編纂此續集的目的之一，很大成分是為了向他的合作導師宇文所安致敬，書中不但收錄了他三篇論文，而且書中的很多作者都是他的弟子（如：鄭文君、陳威、洪越、胡秋蕾等）。即將榮休之際，看到他的弟子已然成為北美漢學界的中堅，宇文先生的喜悅之情可想而知；這也是孟子所說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快樂，相當於我詩中所謂「得嬉遨」的心境。

我也猜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卞東波特意（或有意無意之間）在這本續集裏收進了宇文所安所撰寫的兩篇有關「快樂」的文章：〈快樂，擁有與命名：對北宋文化史的反思〉、〈桃花源的長官〉。第一篇文章的譯者是卞東波本人，第二篇文章則由卞東波和葉楊曦合譯，足見編者卞東波的用心。在〈快樂，擁有與命名〉那篇文章裏，宇文先生討論歐陽修在《六一居士傳》中所表達的歡愉之感（即好讀書、好飲酒，加上擁有周圍物件的歡愉），同時又把歐陽修那種「擁有」的愉悅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所描寫的自得其樂做了一番比較。〈桃花源的長官〉那篇也注重兩種不同「快樂」境界的比較——歐陽修的「快樂」總是「附著在世間某種物品、建築和地點之上」（見歐陽修〈豐樂亭記〉），而蘇軾則宣稱「快樂」乃來自其本身（見蘇軾〈超然臺記〉）。換言之，對宇文先生來說，歐陽修有如「桃花源」世界的長官，經常有眾人聚集在他周圍，使他不斷享受「與民同樂之樂」。相較之下，蘇軾則喜歡自得其樂，並喊他那喜雨亭為「吾亭」。宇文先生這兩篇文章可謂活潑而具有生命力，娓娓道出了他數十年來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刻感受和體會。

重要的是，宇文先生在他的文章裏提醒我們有關「文本家族」(family of texts)的概念——那就是，文本不能被孤立地解讀：

我們通常孤立地閱讀這些文本或將其作為「宋文」的代表，但它們最好被當作一個文本「家族」來理解，這個文本「家族」對於理解其中的單一篇文章非常重要。我們知道蘇東坡〈喜雨亭記〉的結尾有點戲謔的意味，但我們需要聯想到歐陽修的〈豐樂亭記〉，才能完全理解東坡的幽默。有很多縱橫交錯的文本「家族」。這許許多多的文本背後都有文學上的祖先存在，比如陶淵明……。

宇文所安的話正好見證了卞東波這部「文本的新闡釋」選集的特點。例如，在田曉菲教授那篇有關〈古詩十九首〉的文章中，她就通過「文本家族」的分析而意會到

〈古詩十九首〉詩意的不確定性（雖然那組詩歌的語言極有透明性），進而肯定了胡應麟的說法：「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同理，胡秋蕾的文章（〈解讀矛盾的話語〉）通過三家詩對《詩經·漢廣》的注釋之比較，得到了當時女性頗有「優越性」的解讀。康達維 (David R. Knechtges) 通過對應璩其人其詩的研究，對《文選》選集進行了一番批評（因為《文選》只選了一首應璩的〈百一詩〉，因而使後世人無法得知當時應璩的文學地位），這就是所謂的「選集的缺憾」。陳威 (Jack Chen) 在他的〈聞驢鳴：中國中古時代的友誼、禮儀與社會常規〉一文中，更是從《世說》有關曹丕用驢鳴吊王粲的文本一直讀到蘇軾的「路長人困蹇驢嘶」的用語，因而闡釋了「知音」的多種涵義。吳妙慧 (Meow Hui Goh) 則從永明詩歌的新探索說明了有關「知音」概念的轉變。裴凝 (Benjamin Penny) 以細讀《神仙傳》的方法發現有關葛洪的作者問題，進而從事有關版本的考證。鄭文君 (Alice W. Cheang) 通過〈東坡八首〉的細讀，解讀了蘇軾在黃州的心路歷程——那就是從疏離寂寞的心境轉向與世無爭、樂天知命的自我調劑之過程。洪越從細讀敦煌的十一件離婚文書（9-11 世紀），發現當時的離婚與佛教因緣前定的思想息息相關。蔡涵墨 (Charles Hartman) 細讀陸游的《中興聖政草》，仔細分析陸游在一一六三年（即金人入侵宋朝領土，宋高宗匆匆禪位，由宋孝宗繼位的次年）突然接到修纂高宗《聖政》的詔命後，如何重構高宗形象，又如何建構孝宗新政綱領的經過。陳婧則閱讀了無數明代「古詩」總集的副文本 (paratext)，終於發現了許多有關當時副文本（如序跋等）如何決定了書籍的接受 (reception) 等真相。蘇源熙 (Haun Saussy) 以一九三五年梅蘭芳（以「中國公主」的戲劇形象）在莫斯科之旅為起點，剖析了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等藝術標準的矛盾性，進而闡釋了極其複雜的現代主義歷史過程，以及所謂「現代性」的多元性。弔詭的是，蘇源熙發現：歐洲從前的戲劇傳統正是現代中國人「孜孜以求」的，而中國古老的戲曲傳統卻正是歐洲人現在想要得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卞東波這部《海外漢學論文新集》所收的作者已經突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視鏡》的局限，不但收了美國漢學家的論文，而且還收入了歐洲漢學家（魏希德 [Hilde De Weerdt] 教授）、澳大利亞漢學家（裴凝教授）的大作，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海外漢學」的廣度。同時，這本論文集充分表現了海外漢學界「文史不分」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諸位研究古典文學的漢學家以外，這個選集也收錄了數位聞名國際的宋史專家的作品，如蔡涵墨教授、包弼德 (Peter Bol) 教授及魏希德教授的文章。蔡教授論文的要旨已見前述，魏希德的文章

介紹了一九九〇至二〇〇六年間美國出版的宋代歷史學術論著中的兩種新趨向：1. 即撰寫有關地方宗教的風潮（以耶魯大學韓森教授的《變遷之神》為代表）；2. 研究政治史的新趨勢（以戴仁柱的《山下有風：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危機》和伊沛霞的《宋徽宗》為代表）。至於包弼德的兩篇文章——〈王安石與《周禮》〉、〈尋求共同基礎：女真統治下的漢族士人〉——在「補白」的方面尤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這兩個課題都是從前漢學家們所忽視的。所以在〈王安石與《周禮》〉那篇文章裏，包弼德一開頭就說道：「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著述探討王安石對《周禮》的理解。」在〈尋求共同基礎〉那一篇，他更是提出了十分嶄新的觀念——那就是女真皇帝之所以提倡文學和大規模的從事書籍和禮樂器物的收集，其實並非為了「漢」化，而是為了渴求「文」化。

我要特別感謝卞東波教授，因為他在這個續集裏也收了我的兩篇近作。其中一篇〈中國文學作者原論〉乃由香港中文大學張健教授翻譯成中文，在此一併致謝。另一篇文章則是介紹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孟振華先生所編的第一部耶魯中文古籍目錄。因為這部《古籍目錄》正好涉及許多與耶魯大學的歷史和美國早期漢學的興起有關的資料，所以現在知道卞東波所編的《海外漢學論文新集》也能收入此篇，令我特別感到高興。

在此，我衷心希望國內的讀者們也能以充滿快樂的心懷，來欣賞本書中對各種文本的新闡釋。今日匆匆寫來，是為序。

孫康宜

2018年春季寫於耶魯大學

